

构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支持体系

闫小娜 郑联盛 王章慧*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区域合作的新机制,有利于构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包含资金融通等金融服务的内在要求,同时亦需要差异化、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对金融服务的资金、机构、产品、风控等都提出了实质性需求。未来10年,两个经济带基础设施投资的年度资金需求将达到6000亿美元以上,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供给能力相对有限,存在巨大的资金供求缺口。更重要的是,金融支持体系建设存在需求供给负缺口、成本收益不匹配、要约反馈不顺畅、金融与实体经济难融合以及金融服务与风险管理难统筹等问题。为了构建有效的“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支持体系,需要定位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中的作用及边界,注重成本收益性,兼顾政策性,以金融创新引导金融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形成自我强化的要约反馈新机制,形成资源配置新体系,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 金融支持; 机制错配; 供求匹配

JEL 分类号 F36; F42

一、引言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胜利召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历史新阶段。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 闫小娜: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100732 电子邮箱: yanxn@cass.org.cn; 郑联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11层 100028; 王章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与制度弊端分析研究”(项目编号:14CJL01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与金融监管改革研究”(13AJY018)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三五’时期我国的金融安全战略研究”(15AJY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同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依托于基础设施、自由贸易区、产业投资、科技发展、旅游环境建设等诸多硬件和软件建设，本质上是完善全球价值链的协同机制，构建“链条对链条”的新模式（张少军、刘志彪，2013）。“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需要诸多要素和机制的配合，其中金融支持极其重要。“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系统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我国需要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提供差异化、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体系。一是在金融体系的作用和地位上，金融是“一带一路”区域实现一体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金融不仅是一个要素，更是一个融合机制，将大大加速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高端化升级。二是在金融支持体系的基本内涵上，“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新战略，需要构建一个基于需求、有效供给、融合内外金融资源的金融支持体系。三是在金融支持体系风险控制上，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涉及60余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的发展框架，未来可能还有更多国家或地区参与其中），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极为复杂的区域，甚至是区域冲突最为集中的两个经济带，风险问题是事关成败的关键。四是在金融实践上，“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需要坚持对接原则、效益原则、合作原则和开放原则，以市场化可持续的机制进行投资，特别是以股权投资为主，兼顾债权、贷款和基金等多种方式，实现较好的投资回报和财务的可持续性（金琦，2015）。创新多样化融资模式，比如高铁换大米、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项目融资模式（BOT）等，来实现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支持。最后，在金融支持体系的外延上，还包括拓展我国对外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强化金融的区域与国际合作，深化跨境金融监管协调，共同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并构建区域性、全球性金融安全网络等。

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需求与供给分析：以基础设施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项目的实施对金融支持、需求与供给的匹配机制都提出了新要求。“一带一路”倡议不是简单的国际合作、内外贸易和对外投资，而是基于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的多重、深入和全面的合作，是资源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新兴配置方式，是涉及诸多主权国家、多类经济主体、多种经济活动的系统工程，跨区域经济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金融需求和供给的多层次、多元化和综合性。

1.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需求

从金融服务资金需求的规模上，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达到7300亿美元；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十三五”时期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1.6万亿~2万亿美元，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2016—202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6200亿~9600亿美元（袁佳，2016）。如果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其他建设需求，比如外商直接投资、兼并重组、服务业发展等，那么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经济体每年的资金需求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约6.7万亿元人民币）。

在金融服务的机构类别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差异性较大、需求层次多元化，这使金融服务的机构类别也较为多元化。一方面，由于沿线经济体很多还是不发达到经济体或贫困经济体，需要较多的政策性金融服务，比如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多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服务需求。我国发起或参与设立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一定程度上都是满足政策性金融的需求。“一带一路”两个经济带的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涉及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能源、电信、市政建设、生态环保、农田水利等全局性、基础性和民生化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通过金融手段、贷款支持、政策扶持、技术援助以及捐赠等多种方式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长期金融支持。这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发

挥先导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实施和落地更需要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深入参与。第一，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能力远远大于政策性金融机构，是真正的主导型金融主体；第二，商业性金融机构更多考虑成本收益性，只要商业性金融机构愿意真正参与其中并连续支持，就表示此类项目具有可持续性；第三，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项目运作和对非金融实体企业的支撑比政策性金融机构更有优势。

在具体的金融服务产品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最为急迫、最为核心的金融产品就是融资。第一类也是最为基础的金融服务需求是贷款等债权性融资。由于贷款项目针对性强、运作时间短、收益见效快，是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基础金融产品。从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运作上看，2015年，其对交通、水务与城市基础设施、信息通信三个类别的投入中贷款占比超过95%，赠款和技术援助只占较小部分。其他的融资需求亦较为明显，比如债券融资以及“夹层”融资都有一定的需求，但相对于贷款而言是少量的。第二类金融服务需求是股权性融资需求。与债权性融资需求相比，股权融资提供的是资本金，没有偿付压力，同时是长期稳定性资金，更重要的是投资方会作为股东进行价值创造，这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资源。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最核心的外资引入模式，而不是拉美国家的主权债务方式引入，本质上是考虑了股权和债权融资的区别。当然，股权融资是长期融资，政治稳定、法律健全和商业可持续性的重要支撑。第三类金融服务需求是担保类和保险产品。不管是债权性融资还是股权性融资，都面临较大的风险，那么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就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需求。健全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以融资担保、信用保证保险等方式来缓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各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风险补偿机制，市场化融资就难以进行。风险补偿机制缺失是过去较长时间内亚洲区域合作投融资难以有效推进的制约。第四类金融服务需求在于金融创新。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金融体制机制差异大，而金融需求又十分复杂，如何通过创新的方式来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服务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比如，尼泊尔实行盯住印度卢比的货币局制度，印度在贸易结算中人民币为第

四大货币（第五大是港币），未来在为印度提供人民币支付清算机制设计中，如何将尼泊尔考虑其中就涉及技术创新。

在金融服务的流程覆盖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部分都需要项目式、全流程、跨区域的金融服务。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载体是基础设施，而且是跨境的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将会主要以项目的方式进行，那么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融资、管理、运营以及收益分配等都涉及相关的金融服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深入，此类项目及其金融服务的需求将日益强烈。

2.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供给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在过去几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金融创新日益深化，金融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从全球范围看，基础设施投资是重要的领域。国内外金融资源统筹中，“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供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金融服务的资金供给上，中国或将成为最主要的资金供给方。新兴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资金供给上将发挥引领作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定位不一样，政策属性也存在差异。但是，这些机构在短时间内“结伴”筹划或筹建主要是为了填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引导性基金。中国金融市场或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融资场所，不管是国内机构的融资，还是国外机构和项目融资，境内金融市场和中国香港金融市场都将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将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地。

在金融服务供给主体上，中国或将成为一个核心的供给主体。中国主导或参与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急先锋”。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将成为主导性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将可能涉及较多的“一带一路”项目，并提供贷款、投行、咨询等综合服务。

在金融服务的产品供给上，国内各类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融资、贸易结算、贸易融资、外汇、融资租赁、银团贷款、产业基金、兼并重组、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创新等领域将发挥重大作用，提供较为有效的金融产品。特别是，基础设

施投融资上，不管是传统的银行信贷，还是项目融资，以及新兴的产业基金模式、夹层投资模式还是公私伙伴关系模式，国内金融产品供给还是相对较多的。

3. “一带一路”倡议下金融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分析

国内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供给、机构主体、金融产品和综合服务等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相对于巨大的金融需求和复杂的各国环境、项目需求而言，国内金融服务供给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需求仍然存在巨大的缺口。在资金供给上，基本的问题是国外的资源能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主要涉及四类资源：一是国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融资资源；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业化或私人部门融资资源；四是“一带一路”沿线之外的融资资源。不管是区域内部的资源，还是区域外部的资源，不管是政策性金融资源，还是商业性金融资源，“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都是巨大的。

三、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匹配分析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看，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综合金融服务等的需求是巨大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是极其关键的。但是，从此前区域合作、跨境基础设施投融资、亚洲地区互联互通项目等实践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及其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设需要关注五个匹配机制。

1. 金融服务供给与金融服务需求匹配难

“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服务的需求是极其巨大的，特别是两个跨区域的经济带中有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甚至是贫困国家或地区，这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是关键性的。资金的需求和资金的供给错配是基础性的，“缺钱”将是未来“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最为直接的制约，特别是如何吸引私人部门投资将是一个关键问题。

2. 金融服务的成本收益不对称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是极其巨大的，但存在巨大的需求—供给缺口。从趋势看这个需求—供给缺口是长期存在的。这主要在于成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较大，但是，其成本收益

性较低，即市场化的机制难以在基础设施部门发挥作用。相关经济体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机制不健全，比如在内部储蓄—投资机制转换不顺畅，金融市场不发达无法提供中介功能，或者存在金融抑制或金融资源分配极为不均衡等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成本收益在长期是不匹配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是公共产品性质的，其社会的收益远大于私人部门的成本。

3. 金融服务供求匹配是否存在顺畅的反馈机制

基于政治互信的区域合作机制需要考虑到沿线国家和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双向参与性”以及“利益多维性”，必须考虑相关利益方是在一个动态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初次博弈和初次要约对促进合作机制的反馈机制（王玉主，2011）。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存在巨大差异性、政治互信需要强化的基础上，顺畅有效的反馈机制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双方或多方具有绝对且可持续的政治安全互信；第二，双方在利益方面具有较大的交集，且利益分配机制的分歧较小；第三，双方对特定领域的合作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胡滨、郑联盛，2015）。

4. 实体经济与金融服务的匹配

“一带一路”两大经济带的建设是一个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和福利增进的过程。但是，金融支持体系需要有实体经济层面的支持，金融与实体需要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金融支持体系才有支撑点。但是，“一带一路”两大经济带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项目等需要进一步协调经济带内部的结构同质、成本分摊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首先，区域内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同质性较为显著。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结构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一旦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之后，中国资源配置能力将进一步强化，产能有效输出，对于相关国家就是一种竞争关系。其次，基础设施投融资的成本分摊机制难以践行。比如，高铁项目是成本较高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实力或财政实力的约束无法承担相关成本，那么在区域间就难以实现成本有效均摊。最后，“一带一路”两大经济带资源整合机制需要较大提升空间。“一带一路”两大经济带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跨区域的资源配置新机制或者区域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这个机制中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

有不同的禀赋、分工以及相应的价值，但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可能更加注重自身的产业链完整化，这使得“一带一路”两大经济带面临经济主体相对独立和分工相对碎片化的难题。

5. 金融服务与风险管理的匹配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风险水平亦存在重大差别。不管是国内的金融机构，还是境外的金融机构，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构建“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支持体系过程中，都将面临重大的风险，比如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等，而且不同风险可能呈现相互交织的状况。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形势复杂性和项目运作的跨境性，将使未来金融服务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将挑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

四、“一带一路”实施金融支持体系完善的政策建议

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中国将逐步成为亚洲地区乃至“一带一路”两个经济带要素资源整合的枢纽国。基于金融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匹配分析看，“一带一路”区域建设的金融服务供给仍面临巨大缺口。由于金融服务供求缺口、成本收益不对称性、要约反馈不顺畅、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动待强化，以及金融服务供给与金融风险管控需匹配等问题，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立足国情，以商业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兼顾政治、外交和安全等要素，构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有利于区域要素统筹整合，有利于金融体系稳健发展的多层次、多元化、综合性的金融支持体系。

1. 注重顶层设计，定位金融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是重大的系统工程，是“十三五”时期及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与区域、世界经济互动的战略性依托。资金融通和金融要素融合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支撑。在战略定位中，一是定职能。要明确金融支持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支持体系应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发展一体化中发挥战略性支撑，促进两个

经济带的协调发展。二是定边界。要明确金融支持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边界。金融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支撑。但是，金融不是万能的工具，“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问题不是金融支持体系所能单独完成的。更重要的是，金融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和风险管理要求，拔苗助长式、囫圇吞枣式、万能膏药式的金融支持不符合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需要防范以“一带一路”为名、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业务或所谓的“政策性业务”在两个经济带随意开展。三是定原则。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需要有明确的原则，比如政治性、对接性、收益性、稳健性、取舍性等可能都是相关的原则；要考虑哪些经济体的哪些项目使用政治性原则，可以适当放弃成本收益性原则；哪些经济体的哪些项目必须坚持收益性原则，甚至可以明确在符合一定标准情况下可以采用取舍原则，不进入相关的经济体或开展相关的项目。四是定需求。要对“一带一路”区域的金融需求总量、类型、产品和风险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实行区域国别—业务模式并举的矩阵式评估，明确真实需求、可行模式、成本收益和风控环节。除了特定的政治、外交和安全意义之外，需要重点考虑模式的可持续性。五是定供给。要对境内和境外、域内和域外、政策性与商业性机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的金融服务资源、能力、意愿等进行全面的评估，以摸清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的匹配状况，以进行有效的资金需求和供给的匹配。

2. 注重供求匹配，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构建金融支持体系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看，金融支持体系的建设是必要的，通过金融手段可以加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通过资金融通可以有效整合区域要素资源，通过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动可以更快更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发展。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外两个大局的统筹，更好地服务于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应该多措并举，基于金融服务的真实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匹配，搭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支持体系。

第一，需要丰富“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体系。不仅将区域及国际的多边开发银行吸收其中，将国内传统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新筹建的新兴政策性金融机构纳入其中，还需要充分发挥境外政府、金融机构、私人部

门的积极性，形成一个政策性机构引导、商业性机构主导、境内机构与境外机构齐头并进的金融机构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需要微观主体的，金融机构体系的建构是首要任务。

第二，需要完善“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支持的市场体系。一是健全“一带一路”区域投融资市场体系，以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为出发点，构建以银行资金为主体、以银团贷款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投融资机制。二是搭建多元化市场体系，注重亚洲和区域债券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公私伙伴关系、融资租赁、贸易融资、发展融资、绿色金融等新兴市场模式，以支撑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三是建设跨区域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机构，以支付结算、资产交易、信用转换等为支撑，形成区域性金融市场，以配置区域内的金融要素资源，同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需要建立“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支持的“资产池”。在机构、市场体系建设中，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形成“一带一路”倡议金融支持的负债端，即找到机构、找到资金。但是，金融支持体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需求—供给的匹配，是资产—负债的匹配。一定意义上，在一个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下，负债端形成的压力较小，而资产端的形成面临较大的困难，即“一带一路”经济带需要有成本收益合理的资产端。为此，可以利用“一带一路”相关的峰会、论坛和信息交换，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带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资产端信息系统，比如基础设施投融资项目信息系统等。资产端的有效形成是缓释资金供给—需求缺口、成本收益不对称性、金融服务与风险管理难协调等实质性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多渠道、多主体、多方式、主动性“负债”的关键。

3. 注重统筹协调，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向反馈机制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协调中，本质上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博弈。除了特定的政治、外交和安全要求外，双边和多边并举的区域协调机制，是深化政治互信、触发要约反馈以及强化利益绑定的基础。在项目的评估中，需要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4. 注重风险管控，坚持审慎稳健基本原则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将是复杂的工程，风险将是巨大且动态变化的。

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面临的困难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或将都会出现。更重要的是，可能会有很多新的风险层出不穷，这将考验整个倡议的长期可持续性。为了有效管控风险，需要坚持审慎性和稳健性原则，不急于求成，通过逐步开展的方式，先注重软件交流再强化硬件建设，经过国内外统筹的历练和市场化机制的洗礼，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以及综合服务就可能形成一种“自洽性”，形成一种自我循环、可持续发展的业务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辜胜阻、吴沁沁、王建润：“新兴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17年第8期。

胡滨、郑联盛：“亚洲互联互通：中国的战略、政策与行动”，《学术前沿》2015年第11期。

蒋冠宏：“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进入策略”，《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9期。

金琦：“‘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金融支持与合作”，《清华金融评论》2015年第9期。

王玉主：“‘要约—回应’机制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2017年5月14日。

徐秀军：“亚洲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和战略调整”，《当代金融家》2015年第11期。

袁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资金需求与投融资模式研究”，《国际贸易》2016年第5期。

张少军、刘志彪：“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从全球价值链走向国内价值链”，《经济管理》2013年第8期。

Asia Development Bank: Annual Report 2015, April 2016.

（责任编辑：春耕）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aspects by 2020, it is necessary to precisely identify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atic and dynamic disparities between income poverty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with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0, 2012 and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two measures is 18% in 2014. In other words, 76 percent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ouseholds are not considered as the poor in terms of income poverty, and 64 percent income poverty households are not considered as the poor in term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People from a less educated background or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oor in both measures of poverty.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disparity between the dynamics of the two measures of poverty. Among those who rose in the income dimension, only about 24 percent also rose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from 2010 to 2012, and decreased to 16 percent from 2012 to 2014, but the share of people that are extremely multidimensionally poor has hardly fallen. Based on our research,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adopt a comprehensive poverty standard including income poverty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pay high attention to deep poverty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income, education, health, sanit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Poor Population, Income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Dynamics

JEL: I38, O22

Building a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YAN Xiao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732)

ZHENG Lianshe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ASS, 100028)

WANG Zhanghui (Graduate School of CASS, 100028)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new mechanism for building a wider, higher level and deeper regional cooper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global free trade system and an open world econom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itiative contain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financial services such as finance, and also requires a differentiated, diversified and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service support system. It also proposes substantive needs of financial services, funds, institutions, products, and risk control. In the next 10 years, the annual capital demand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he two economic zones will reach more than 600 billion US dollars. However, the funding need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relatively limited, and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funds. More importantly, the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has problems such as negative supply demand, mismatched cost and benefit, unsatisfactory feedback,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and physical economy, and difficulty in coordinating financial services and risk management. In order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 finan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necessary to position the role and boundar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focus on cost-benefit, consider policy, and guid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achieve effective allocation and formation of self-finance through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enhanced offer will feedback new mechanisms to form a new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to achiev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One Belt, One Road”, Fi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 Mismatch,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JEL: F36, F42

Strategic Thinking on Establishing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ust System

WANG L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CASS, 100028)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ust, established by the principal with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njoys as the trust property, whose purpose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of the trustee, in the cre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aintenance of righ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s financial support role. With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symbol,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ntry into a new era of socialism, the innovation of the trust system function to serve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rust industry and the promo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t present,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implements the mode of self-management of rights holders and entrusting others to manage. However, different management models have corresponding defects. Trust is a highly flexible financial system arrange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ratio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usts, Innovation of Trust System

JEL: K11

The New Era Connotation and Measures Suggestion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ANG Zhaoyang (Agriculture Bank of China, 100005)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urately judged the new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propo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